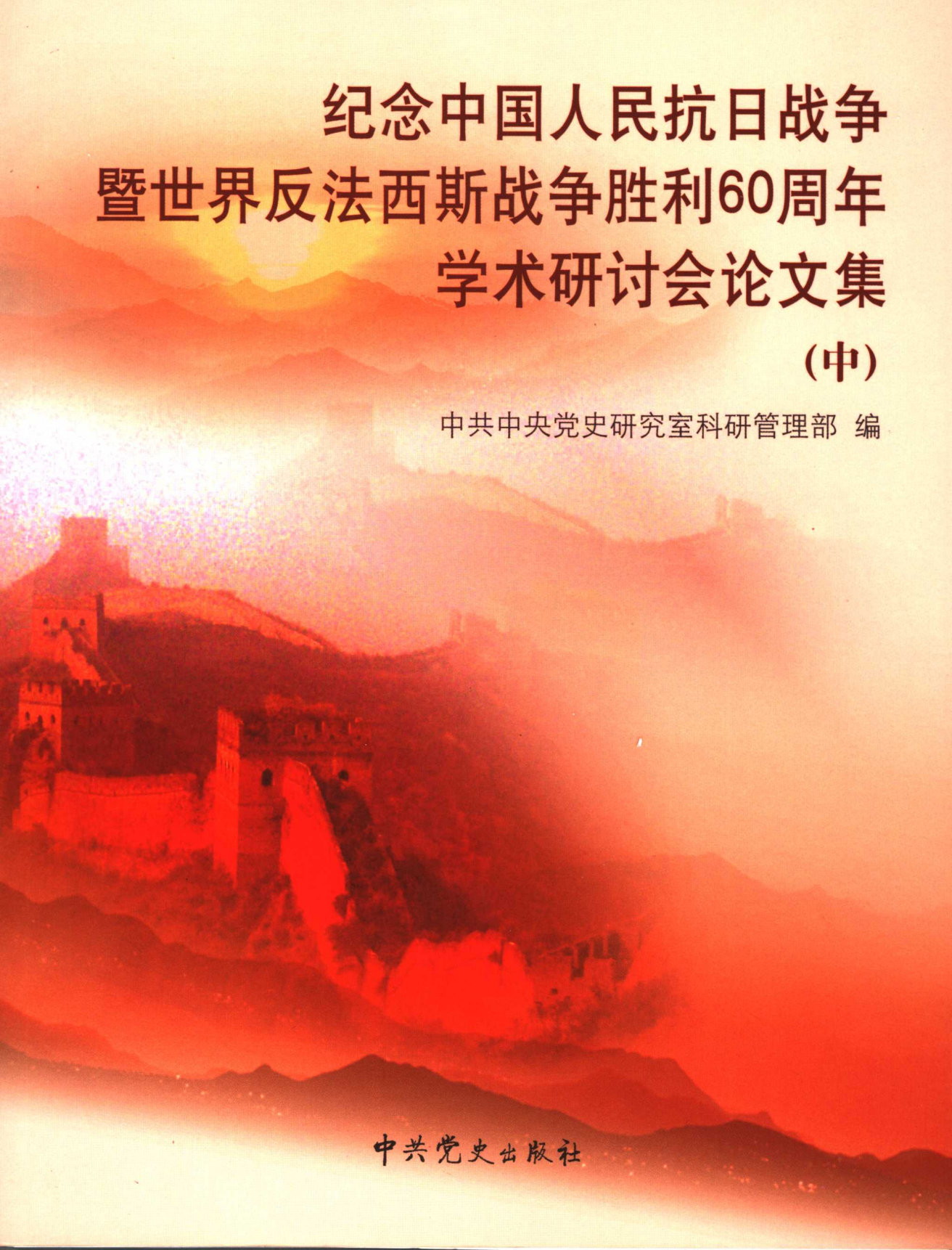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 中国史学会 编

（京）新登字001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黄 艳
封面设计：段文超
责任校对：邹祖兴
龚秀华
责任印制：谷智宇

目 录

中 册

中共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特点和历史经验	郭德宏 / 455
论抗日根据地民间文艺运动	郭必恒 / 464
生产展览会与抗日根据地经济	严清华 杜长征 / 474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防治腐败的基本经验	邵景均 / 483
论抗日根据地的金融稳定政策	汪澄清 / 494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禁毒斗争及其历史启示	齐 霁 / 503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执政与科学执政	郝彭证 张宏华 / 512
试论抗战时期党的干部制度建设	陈丽凤 / 521
抗日根据地与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	
——以华中抗日根据地为例	杨丹伟 / 530
试论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教育	姚尚右 房列曙 / 542
从“三三制”看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陈先初 / 551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与政府改革探析	蒋 杰 张克非 / 562
论抗战时期延安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	唐 萍 / 574
论南泥湾大生产在抗战中的典型意义	李开全 / 584
试论抗战时期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	王新生 / 591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历史考察	
——以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权为研究中心	田苏苏 / 603
试论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解放沦陷区的战略	王志刚 / 613

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创新发展	葛东升 / 624
论左权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思想	潘泽庆 / 634
人民战争的悲壮号角	
——抗战军歌综论	朱加荣 / 644
论中国共产党对日作战的攻势防御战略	张云 / 65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海军抗战及战略地位	张晓林 陈涵 / 662
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的历史地位	孙杰 / 670
东北义勇军抗战的历史地位	胡玉海 / 678
论新四军华中抗战的伟大功勋及	
其历史启迪	江苏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会课题组 / 689
华南敌后抗日战场的开辟及其历史意义	陈弘君 / 699
论滇缅印抗战的特点	王文成 / 709
略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东北抗日联军	孔令波 孔强 / 719
论刘少奇在华北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政策的重要贡献	王双梅 / 731
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人民的抗日斗争	陈夕 / 743
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程中原 / 754
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处理宗教问题的	
历史经验	何虎生 江涛 / 766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李良志 / 776
海南黎族人民在抗战中的贡献和作用	程昭星 / 782
论藏族对抗日战争的贡献	王国新 / 791
少数民族与抗日战争	陈国裕 祁若雄 / 799
中国共产党与新疆抗日救亡运动	张志安 / 813
塔城民众在抗日民族救亡中的历史贡献	蔺茂奎 / 820
简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东北的最早形成与实践	王丽文 王超 / 827
抗战时期国民参政会研究	
——兼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各派政治力量的关系	周勇 / 835
抗日战争前后中国共产党在回族地区民族区域	
自治的政策与实践	马晓梅 / 847
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共七大	李颖 / 852

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确立与中共驻
共产国际代表团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
伟大胜利的重要法宝

张喜德 / 862

中共中央统战部 / 874

中共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特点和历史经验

郭德宏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政权,和国民党建立的政权形成鲜明的对照,也和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工农民主政权有着明显的不同,有着突出的特点,创造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关于这方面的特点和经验,很多学者已经作过论述,可以总结出很多,但我认为最突出的有以下七个方面。

建立议行并列的政权体制,加强对政府的监督

如何科学地设置政权体制,是政权建设首先遇到的大问题。政权体制的设置是否科学,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定。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政权,有的学者认为是一个由参议会、政府和法院三部分组成的“两权半”政权。之所以说“两权半”,是因为抗日根据地均未设立检查机关和司法机关,一切有关的司法工作均由高等法院负责,法院在行使司法职权时虽然是独立的,但在政治上、行政上受政府领导,只是“半独立”。^①在这“两权半”的政权体制中,最有特点的是各级参议会的设立。

各抗日根据地的参议会参照国民政府公布的《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建立的,一般分为三级,即边区、县和乡三级。关于各级参议会的职权,按照1939年2月1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选举各级政府主要成员;第二,制定施政纲领;第三,决定重大事项,制定法律法规;第四,监察及弹劾各级政府之政务人员,督促及检查各级政府执行参议会决议案之事项。^②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抗日根据地的参议会不仅仅是一个民意机关、咨询机关、议政机关,而且是边区、县、乡中最高的立法机关、权力机关、监督机关。不仅各级政府组

^① 李智勇:《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1937—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32页。

^② 《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编辑组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发行,第160—161页。

成人员要由它选举产生,边区、县、乡中的大政方针要由它决定,各项法令、法规要由它制定和通过,更重要地是政府要向它负责,接受它的监督及弹劾。

古往今来的事实已经充分地证明,没有监督的权力是容易懈怠的,甚至是容易腐败的。因此,各抗日根据地的参议会对政府的监督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参议会对它的这项权力也是非常重视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在1941年12月11日写的《边区、县参议会常驻委员会的工作》中就说:除了处理会内的日常事务外,参议会常驻委员会的第二项工作就是“监督同级政府对参议会决议之执行”。参议会大会议决的事项交给政府以后,必须监督政府“做得好”,“我们不允许议好了不做,或者做得遇到困难就拉倒”。为了更好地监督政府,参议会常驻委员会“有权听取政府工作报告”,“有权向政府提出建议和询问”,“有权派代表出席政府委员会会议”等等。^①

从当时的很多材料来看,各抗日根据地的参议会对政府的监督是有力的。这就说明,抗日根据地的参议会虽然是参照国民政府公布的《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建立的,但它和国民参政会有着根本的不同。与中外历史上的议会相比,它也有着根本的不同。

实行“三三制”,建立一个包容性更强、代表性更广泛的政权

政权人员如何组成,是政权建设遇到的第二个大问题,它既表明了政权的性质,也直接关系到它的阶级基础是否巩固和群众基础是否广泛。

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民主政权不同,抗日根据地政权最显著的特点,是从1940年开始实行“三三制”,即在参议会和政府组成人员中,不仅有工农代表,还有其他阶级阶层的代表,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共产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对于“三三制”,一般都把它理解为抗日根据地政权组成人员的分配问题。有的学者已经指出,从狭义上看,这种理解并没有错,而且明确这种人员的分配比例是重要的。但又不能把它简单地理解为人员的分配比例问题,实际上它包括了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上一系列原则问题,即抗日根据地政权的性质、成员分配、组织形式、中共的领导地位、民主选举制度以及施政方针问题等,体现了这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完整思想。^② 有的学者还指出,“三三制”的精神实质是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建设一个包容性更强、代表性更加广泛的政府形象;有时也有让另一种势力来监督共产党,以防止自身腐败和激励工作效率的作用。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也带有

^① 《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编辑组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第657—658页。

^② 杨圣清:《新中国的雏形——抗日根据地政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4页。

对原来的农村各种势力重新安排权力结构的意思。^① 这些分析都是有道理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其实质就是为了反对在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实行更广泛的民主政治，建立一个包容性更强、代表性更加广泛的政权，以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

“三三制”的实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其中最突出的，是使边区各级政权有了广泛的代表性，有力地调动了社会各界团结抗战的积极性。晋察冀边区的领导人刘澜涛在做工作总结时曾提到：“地主士绅在社会地位提高了。因之，他们也较活动了。（如灵寿某大地主自动组织宣传队实行选举。涞源某年过五旬之老地主，爬山越岭，冒着枪林弹雨参加涞灵战役等。）”一些跑到敌占区的地主开始回乡，乡绅富商也有了在根据地投资经营的积极性。华中根据地实行“三三制”以后，原地方精英与新四军和抗日政权出现少见的融洽气氛，特别是一些被选进或者聘任为参议员和区代表的乡绅，表现出了空前的抗日热情，有的将自己的儿女送到新四军，有的甚至捐出自己的田产，动员农民参军。而一些本来就有武装的地方精英，也纷纷把武装交出来，归到新四军里。乡绅的积极性起来以后，减租减息的阻力也相应地减小了。^② 另外，“三三制”也使边区政权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大大加强，提高了边区各级政权机关的工作效率。

有的学者指出，“三三制”是建立在对阶级结构客观深刻认识基础上的政治构架，真正体现了政权的民主性质，是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杰作；是根据地进行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的开创性尝试，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建设一种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诚意；^③ 有的甚至认为，只需在“三三制”的基础上稍加完善，辅之以民主建设，就能有一个比西方三权制科学实用得多的政治构架。^④ 当时林伯渠也曾认为：“中国完全有可能由这‘三三制’坦途走向民族解放以至于最终的人类解放。”^⑤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三三制”虽然没有能够继续坚持下去，但对于怎么建立一个包容性更强、代表性更广泛的政权，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实行普选制和竞选制，使广大群众具有监督权、罢免权

政权组成人员特别是主要的领导人如何产生，是政权建设遇到的第三个大问题。

① 张鸣：《“三、三制”政权的政治象征》，《当代中国研究》1999年第2期。

② 张鸣：《“三、三制”政权的政治象征》，《当代中国研究》1999年第2期。

③ 陈先初：《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建政的历史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张生、袁新国：《实体民主与程序民主的历史观照——中共抗日根据地民主实践透视》，《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④ 夜朗：《政治构架：延安三三制比西方三权制好》，“凯迪网络”（[http://www. cat898. com](http://www.cat898.com)）2004年3月30日。

⑤ 转引自陈志远、王永祥：《抗日根据地政权“三三制”与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关系》，《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253页。

其中最重要的,是广大人民有无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

为了建设民主政治,把广大群众动员起来,各抗日根据地都实行了普选制和竞选制,通过普选和竞选选出各级参议会参议员,然后由各级参议会选出政府组成人员。1939年1月由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明确地规定了“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投票选举制及选举方法。其中对竞选明确规定:“各抗日政党及各职业团体,可提出候选名单,进行竞选活动,在不妨害选举秩序下,选举委员会不得加以干涉或阻止。”^①随后,其他抗日根据地也做出了类似的规定。

由于实行了普遍的无差别的民主选举,特别是由于允许竞选,选民就可以对候选人进行选择,以最终选出自己满意的人员,因而充分调动了广大群众参加选举的积极性。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里就曾说:“当着候选名单公布以后,每个乡村都热烈地参加讨论,有的批评某人对革命不积极,某人曾经反对过革命,某人曾经贪污过,某人曾经是流氓,某人曾吸食鸦片等等。有的选民则公开涂掉其名字,有的则到处宣传某人的坏处等等。又如安塞四区一个乡长因工作消极,蟠龙区一、三、五乡乡长不能代表群众利益等,均遭反对为候选人。至于那些平日对抗战工作努力的分子,在选举中都当选了。”^②

由于实行了普选制和竞选制,广大选民不仅可以选出自己满意的人,而且可以随时罢免那些不合格的人,从而加强了群众对参议会和政府成员的监督。例如经过1941年的改选,延安县乡政府委员中连任者仅有133人,新当选者为185人,61个乡长中有41个是新当选的;安定县70%的乡、市政府人员是新人;绥德旧乡政府委员落选者达101人。这说明,那些渎职和不称职的干部,在选举中被淘汰了。^③

广大群众对参议会和政府成员的监督,不仅表现在选举过程中,还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例如在陕甘宁边区,“要是哪个工作人员办事不好,不忠实于群众利益,那末不管他是谁,人民都有权来批评他,甚至加以撤换”。平时,“农民也普遍的讨论关于政府工作的缺点,以及自身利益的许多问题。政府工作人员不是去压制他们,而是倾听他们的意见,来改正自己工作的缺点。老百姓常常这样说:‘现在的人胆子大了,连乡长也可以批评起来,过去是不敢这样说的’”^④。

由此可见,普选制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基础,是激发广大群众积极性的有力措施。而竞选制,是选优汰劣的有力措施。

① 《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编辑组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第159页。

② 《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编辑组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第118页。

③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的工作报告》,1941年11月8日、9日,《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编辑组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第250页。

④ 左健之:《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的特点及其在乡的具体实施》,《解放》第104期,1940年4月20日。

实行“精兵简政”原则,达到执政成本与社会负担的均衡

政府组成人员是少而精,还是多而冗,也是政权建设的一个大问题,直接关系到政权的执政成本和社会负担。如果执政成本过高和社会负担过重,就会影响到社会的发展甚至政权的稳定。

在这方面,中共中央根据李鼎铭先生的建议,实行了著名的“精兵简政”政策。从1941年年底到1943年,各抗日根据地一般都进行了三次精简。这项政策的实行,其直接原因固然是为了克服当时的严重困难,但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其实质是为了降低执政成本和减轻社会负担,以达到二者的均衡。^①经过这几次精兵简政,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机关大大压缩,群众负担明显减轻。例如陕甘宁边区1945年征收的公粮,从1942年的20万担减少到12万担,减轻了五分之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脱产人员共减少了3万人,占原脱产人员的27%。再加上军队的精简,更减轻了人民的负担。^②另外,机关人员和军队减少了,对民力的征用也随着减少了。例如延安县1941年征用民力60025人,1942年减少至28493人,减幅52.4%;绥德县1941年征用民力74196人,1942年减至900人,仅为上一年的八十二分之一。^③

精兵简政也有利于提高各级政权机关的办公效率。因为重复的机构、冗余的人员被撤销了,扯皮现象、互相推诿现象、因人设事现象等大大减少,办公效率自然会随着提高。1943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精兵简政工作的总结,就充分地肯定了这一点。^④

群众负担减轻了,办公效率提高了,政府的威望也就会提高。因此,“精兵简政”的直接目的虽然是减轻群众的负担,但在政权建设中的意义却是非常重大的。

严惩贪污腐败,保持良好作风,建设廉洁政权

一个政权有没有良好的作风,特别是是否廉洁,直接关系到民心的向背。因此,切实加强廉政建设,是任何政权都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为了使抗日根据地政权保持一个良好的作风,特别是为了把它建设成一个廉洁政权,中共中央和各抗日根据地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

首先,对各级领导人的生活标准做出严格的规定,领导人一律不准搞特殊化,和群

① 李智勇:《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1937—1945)》,第53页。

② 朱玉湘:《论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③ 阎树声等:《陕甘宁边区史》,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

④ 《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编辑组编:《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资料选辑)》,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页。

众一样过苦日子。例如在陕甘宁边区,从基层的乡长到最高层的边区政府主席,都实行津贴制度,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工资的水平。当时国民党的县长每月薪俸为180元,而边区的县长每月津贴仅为2.5元,边区行政长官每月最高的津贴也只有5元。县政府每月办公费平均在20元至30元之间。^①因为领导人一律不搞特殊化,所以即使生活再苦,群众也没有怨言。正如邓小平所说:“为什么过去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渡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②

其次,严惩贪污腐败现象。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制定了严厉的惩治贪污腐败的法令。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和各抗日根据地继续沿袭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做法。例如陕甘宁边区1938年8月15日公布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将贪污罪详细列举了10条表现,对犯有这些罪行者做出严厉的惩治规定:(一)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5年以上之有期徒刑;(二)贪污数目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3年以上5年以下之有期徒刑;(三)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上至3年以下之有期徒刑;(四)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苦役。同时,应追交其贪污所得之财物,无法追交时得没收犯罪人财产抵偿。这些严厉的惩治措施,有力地遏制了腐败现象的蔓延。

再次,加强群众对各级干部的监督。古往今来的无数事实已经证明,仅仅有政权内部的监督,对于遏制腐败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广大群众的监督。各抗日根据地在发动群众监督干部方面,做得也是成功的。这不仅表现在选举过程中,还表现在平常的工作中。正如谢觉哉所说:“有广大人民的力量来监督政府,监督工作人员,人可以幸逃法网,但不能逃出人民的视线。坏事就不易发生。”^③彭真在谈到晋察冀边区的廉政问题时也说:“至于贪污,政府依靠着广大群众之监督和协助,已相当的肃清或正在肃清”;“边区政府依靠着民众的检举,才相当保证了各县政府的廉洁,并间接保证了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④。

由于上述的有力措施,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形成了一种清正廉明的作风,得到民主人士和广大群众的高度赞扬。1941年4月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中即说:“有些绅士经过我们县长几次‘说情婉拒’,‘进贿峻拒’之后而感叹起来(如陇东)。有些劳动人民见我们生活太苦,说:‘你们如何不派点款,难道你们最低生活我们都不能负担吗?’(如绥德)有些外来参观者,实地看见了这些情况,才恍然说:‘天下竟有这

① 刘政:《新民主主义民主政治的成功实践——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中国人》2002年第2期。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页。

③ 《再论边区民主政治的实际》,《谢觉哉文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7页。

④ 彭真:《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政权》,《解放》1938年10月30日。

样的官!’”^①

切实为群众谋利益,把政府建成“帮忙政府”

是为人民还是为自己,这既是由政权的性质决定的,反过来也会影响到政权的性质,因此它也是政权建设的一个根本问题。

抗日根据地政权是人民政权,因此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切切实实为群众谋利益。这种政权,被毛泽东誉为“帮忙政府”。他说:“有两种政府,一种只知道刮刮刮,另一种则帮老百姓的忙——边区政府就是这种帮忙政府。”^②抗日根据地政权的这个特点,体现在各个方面,其最突出者有三:

首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保障人民的一切民主自由权利。当时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政权,对人权、(参)政权、财权、自由权是非常重视的,各地颁布的施政纲领和有关条例,都对人民的这些基本权利作了明确的规定。例如1941年5月1日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即“五一纲领”)明文规定:“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而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③为了切实保障人民的人权、财权,陕甘宁边区在1942年1月1日还专门颁布了《边区政府保障人权财权条例》。即使对于少数人如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基本权利,在一些法令法规中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把保障人民权利提到如此重要的地步,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④

其次,一心一意为群众谋利益。既然是“帮忙政府”,就要千方百计为群众帮忙,为群众谋利益。早在1934年1月,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明确提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问题,即要帮助群众解决穿衣、吃饭、住房、柴米油盐、疾病卫生、婚姻等问题,实际上就是为群众谋利益。1942年12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更加明确地提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他说要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

①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三辑,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17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160页。

③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一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6页。

④ 陈先初:《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建政的历史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

这些问题,这“是每个在农村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第一位工作”^①。正因为抗日根据地政权不仅保护群众的利益,而且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所以才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

再次,始终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要为群众谋利益,就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倾听群众的意见,关心群众的疾苦。彭真在谈到晋察冀边区的工作时就说:“政府对于各种重大事项,都以各种形式发动民众讨论,民众经过行政会议,或其他自己的组织系统,可以自由向政府提出他们的意见,要求政府实行某些善政,或取消某些弊政,并可以得到满意的实际的回答。”^②因为政府的工作人员是民选的,所以十足地“平民化”,甚至和群众没有什么区别,从来不摆官架子,群众有什么意见和要求,也敢于和乐于向他们提出。

这样的“帮忙政府”,是根据地政权的最基本的特征,也是抗日根据地政权能够得到群众拥护的最根本的原因。

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实行正确的执政方式

抗日根据地政权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如何处理党政关系,直接关系到能否实行正确的执政方式,这也是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政府的领导人,对正确处理党政关系是十分注意的,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又不是党政合一,由党完全控制政府,而是实行党政分开,不去干涉政府的工作,使政府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为了真正做到这一点,当时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及有关报刊明确地批判了“一党专政”、“以党治国”等思想。1940年12月,刘少奇在《论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指出:“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作为民主的势力,愿意为大多数人民、为老百姓服务,为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而奋斗。这种政权,不是一党一派一人所得而私的。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处,如果能够建立政权的话,就要建立统一战线的革命各阶级联合的政权。即或因为人民的组织程度不够,而不得不委任临时的地方政府人员的话,那末,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够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来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这也是包办不了的。”^③1941年4月15日,邓小平也指出:“党

①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467页。

② 彭真:《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政权》,《解放》第55期,1938年10月30日。

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6—177页。

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这是与‘以党治国’完全相反的政策。”^①

由于实行“三三制”,在参议会和政府内部,也有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怎么和其他方面的人士合作共事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提出“三三制”的政策时就说得很清楚:“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②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在《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又批评了一些人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明确提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③因此,在参议会和政府中工作的共产党员,都十分尊重其他方面的人士,使他们既有职,也有权,对于他们的不同意见,耐心地听取,平等地和他们协商。因此,在“三三制”政权内部,党政关系处理得也是比较好的,参加参议会和政府的其他方面的人士都工作得十分舒畅。

从以上七个方面可以看出,抗日根据地政权是民主的、精干的、清廉的、为民的、包容性很强的、具有有力监督的、实行正确执政方式的政权。它虽然也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具有鲜明的特点,留下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认真总结这些特点和历史经验,对于认清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得到民心,取得革命的胜利,今天应该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都是很有价值的。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① 《党与抗日民主政权》,《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4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9页。

论抗日根据地民间文艺运动

郭必恒

一、抗日民主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民间文艺适应 抗战需要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日本侵略者不断加紧对中国的“蚕食”,中国的大好河山一天天被侵略者的铁蹄践踏。“满耳是大众的嗟伤,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日本法西斯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义愤,团结起来,坚决抗战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成为文艺作品的主旋律。作为与民众生产生活关系最为紧密的民间文艺,当然也贯穿着人民团结抗战的精神。

人民要求抗战的思想感情往往直截了当地表露于民间文艺作品之中。例如陕北民歌《全家闹革命》:“全家老少总动员,抗日工作大家干。爸爸参加运输队,哥哥背枪上前线。妈妈缝衣姐姐洗,妹妹看护伤病员。我和弟弟年纪小,站岗放哨也不闲。”这首歌本身就是一幅生动感人的全家抗战的图画。同时流传于河北的一首歌谣唱道:“嫂嫂站岗村头西,俺娘灯下做军衣;大姐站上抬担架,鸡毛信儿俺送去。”这些生动活泼的民间文艺作品清晰地刻画了在抗日烽火燃遍神州大地的那个年代,全民族动员起来参加抗战的斗争场面。抗战期间,沉重的民族灾难,激起了人民反抗的斗争热情,而民间文艺也随之而变得空前地活跃和繁荣。

民间文艺适应抗战的需要,有了新的发展,形成了种类丰富、内容广泛、思想进步、感情激烈真挚的抗战民间文艺。抗战时期民间文艺新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从内容和情感上看,更为健康向上。传统民间文艺的主流是积极健康的,但毋庸置疑,一直以来民间文艺之中也确实存在一部分格调低下的不健康内容。在大敌当前、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里,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战民间文艺更多地表现出人民心灵深处迸发出来的保家卫国的激情,它们的内容是健康向上的,情感是豪迈而奔放的。第二从思想性上看,抗战民间文艺作品体现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也反映了人民痛恨法西斯主义,反对分裂主义,要求团结抗战的信念,思想更为积极进步。特别是抗日民主根据地民间文艺作品,进步更为显著,除人民团结抗战的普遍要求外,它们还深刻地反映了人民追求翻身解放、自由平等的思想。例如江苏抗日歌谣唱道:“黄